

探析臺灣／韓國冷戰時期吧女小說的性別與階級

林文玉*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戰後臺韓社會變遷下，臺灣「吧女」與韓國「洋公主」如何在冷戰局勢與戰爭經濟運作下，淪為受迫的邊緣群體。文中分析臺灣黃春明〈小寡婦〉、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與韓國李範宣〈誤發彈〉、南廷賢〈糞地〉，探究女性在經濟困境、社會污名與家庭崩解中的掙扎。這群女性因美軍駐紮而進入特種行業，既承載殖民與戰爭的創傷，亦深受資本體系剝削。文學作品對此發出控訴，反思社會的不公批判及戰爭對女性的結構性壓迫。本文聚焦於其生命困境與焦慮，透過描繪貧困與生離死別下的破碎家庭，深刻突顯種族、經濟與性別交織的嚴肅議題。

關鍵字：吧女、洋公主、性別、階級、女性文學

1. 前言

二次大戰後，美國先後介入韓戰與越戰，為了滿足駐外美軍的性與娛樂需求，在越南、韓國、菲律賓、泰國、臺灣、沖繩與日本設置休閒娛樂中心，合法進行性交易，似日本於二戰時在東南亞各地設置的慰安所。冷戰期間，實施了休息與復原計畫（Rest and Recuperation Program, R&R）¹⁾。該計畫帶動了城市的經濟發展，促進了酒吧等性相

* 中國文化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1) R&R 計畫的歷史背景：1964 年東京灣事件後，美軍大規模投入越戰，並設立 R&R 計畫。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士兵得到休息、紓解壓力，以維持士氣。R&R 計畫影響亞洲國家（如日本、泰國、臺灣、韓國）因美軍休假需求，性產業興起。酒吧、舞廳、按摩院成為經濟支柱，卻引發社會爭議。美軍消費能力帶動當地經濟，但也帶來文化衝突與社會問題。臺灣的 R&R 與性產業發展為

關產業的發達。然而，這也引發了當地社會對美軍行為的不滿、對性工作者的道德譴責，引發了性剝削、混血兒等的問題。以臺灣為例，許多女性進入酒吧業，為了掙脫原生家庭貧困的桎梏，或為了虛榮心，期盼藉由與美軍的親密關係，以改善經濟地位，換取前進美國的梦想，但其中能達成所願的少，身陷沉淪的多。在殘酷的資本結構限制下，多數最終仍面臨向下流動與邊緣化的處境。

韓國則是於1950年代韓戰以後，由人口買賣、職業介紹、詐騙等方式，為生計，或亦因情勢所迫，流入「洋公主」²⁾行列。這些女性大部分是戰爭孤兒、貧民或與丈夫生離死別的女性。當時韓國政府為了不妨礙她們與駐韓美軍的交易，教她們英語會話，有組織地進行性病管理。但她們也受到社會無情對待與歧視。³⁾

在戰後臺灣和韓國，由於政權更替、經濟重組以及後來駐軍等因素，從事酒吧工作的「吧女」與「洋公主」經歷了複雜的社會改變。這些女性不僅是經濟貧困之下的產物，更是國際政權和經濟發展下的犧牲品。但臺灣和韓國的美軍，在形態上卻有一些區別。如臺灣是在越戰的「休假(R&R)」背景，而韓國是戰後「美軍駐軍」。臺灣是越戰期間來臺休假的美軍，是在恐懼中，尋求短暫的慰藉。韓國則是韓戰後長期駐紮的駐韓美軍，是一種常態的軍事佔領，美軍手握經濟與政治權力，更近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而非單純的戰時慰藉。兩者好比「過客般的參戰軍人」與「常駐的佔領軍人」。臺韓兩者雖在性質上有些微不同，

1968年，酒吧產業迅速成長。基隆、高雄、清泉崗等地成為美軍活動地點。政府雖然表面禁止性交易，但實際上默許其存在。參見蔡岱叡，《臺灣文學中越戰時期吧女小說的批判與抵抗——以陳映真〈六月裡的玫瑰為例〉》，頁31-60。

- 2) 在美軍基地村與美軍進行性交易的女性，被總稱為「慰安婦」、「美軍慰安婦」、「基地村慰安婦」、「洋媳婦」、「洋葛寶」、「洋夫人」、「聯合國夫人」、「洋公主」等。韓國政府的正式名稱是「慰安婦」。「洋葛寶」是1945年9月美軍進入韓半島後出現的用語。1945年至1948年間，韓國人對美軍周邊女性的看法非常負面，加上對美國的反感出現的貶低性表達。「聯合國夫人」以韓國戰爭為契機，美軍在韓國的影響力增強，形成了不能隨便對待的氛圍。特別是在戰時，隨着強調通過美軍賺取美元，為了國家利益尊重她們的觀念產生影響。此後，「洋公主」一詞被廣泛使用。出自김현선, 김정자, 《미군 위안부 기지촌의 숨겨진 진실》, 새움터 (기획), 한울, 2020.11.20.
- 3) 參見정현주, 〈대한민국 제1공화국의 여성정책 연구〉, 梨花女子大學校史學科博士學位論文, 2004, 頁114。

但在「經濟困境導致賣身」的社會學層面，女性身體被剝削的意義上，卻有其相似性。故在此以分析兩國作家如何透過吧女／洋公主書寫對美國霸權的不同回應，如何導致了不同的文學再現。探討臺韓兩國同受美國冷戰影響的「共同性」，以及探究臺灣（越戰休假/經濟起飛）與韓國（長期駐軍/戰後重建）間的根本「差異」。

II. 先行研究回顧

在探討東亞冷戰時期的性別與文學議題上，學界針對臺灣「吧女」與韓國「洋公主」已分別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在臺灣，研究多聚焦於美軍休假計畫（R&R）所衍生的社會現象與性產業發展。歷史與社會學視角上，郭彥伯（2019）初探了冷戰體制下美軍來臺性觀光的歷史，以及吧女的勞動剝削處境；陳中勳（2018）則關注美軍與吧女遺留的混血兒群體，探討其在成長過程中所遭受的邊緣化與社會歧視。在文學文本分析上，陳正芳（2012）剖析了黃春明等作家如何透過文學建構美國人在臺灣社會的形象與文化交流印記；蔡岱叡（2021）則探討吧女小說中的社會爭議與抵抗意識。黃春明〈小寡婦〉常被置於七〇年代城市文學與資本主義批判的脈絡下，探討文化交流中的美國人形象建構與商業行銷反思。針對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的研究，吳明宗（2010）指出了其為底層職場女性發聲的特質；戴華萱（2023）更深入分析其筆下的女性性工作者，探究吧女在物質引誘與悲慘現實間的矛盾心理，凸顯了女性作家超越單一性別對立的細膩關懷。

另一方面，針對韓國「洋公主」與美軍基地村文學的研究，則強烈聚焦於帝國霸權批判與民族創傷。김만수（2008）指出，韓國小說常將美國軍人描繪為凌駕於韓國人之上的統治者與征服者，並深刻剖析韓國社會對美國既盲目追隨又充滿自卑的複雜心理；변화영（2015）探討了戰後作家對於「解放村」此一真實空間的體驗，以及底層生存絕境的文學再現。針對南廷賢〈冀地〉的專論尤為豐富。學界多從1960年代的意識形態、文化政策、家族敘事與跨國霸權（如與沖繩文學的比較）等視

角，剖析其對外勢桎梏的悲憤控訴。강진호 (1999) 以此探討外力壓迫下的民族主體性喪失與抵抗；구장황 (2023) 從1960年代文化政策與國家意識形態角度，探討該小說所面臨的審查命運；박영준 (2010) 分析了小說中強烈的悲傷諷刺手法與傳統家族在強權下的崩解；이명원 (2021) 更進一步跨國比較韓國與沖繩文學，批判美國霸權主義在東亞的運作模式。而李範宣〈誤發彈〉的研究，則深刻探討了戰後貧民區（解放村）的空間體驗與底層生存絕境。

綜觀上述先行研究，可發現臺韓學界已在單一國家的歷史脈絡與文學評析上奠定堅實的基礎。然而，將臺灣「吧女」與韓國「洋公主」置於同一框架下進行跨國比較的文學研究仍相對匱乏。既有研究鮮少直接對話並突顯兩者在冷戰地緣政治下的根本差異。因此，本文的問題意識即在於填補此一學術缺口，透過文學文本的互文對照，釐清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冷戰軍事結構，如何導致臺韓作家在再現女性性別壓迫與階級困境時，產生之根本性差異。

本文企圖突破單一國家的敘事框架，透過比較黃春明〈小寡婦〉、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與李範宣〈誤發彈〉、南廷賢〈冀地〉四部作品，探究兩國作家如何分別回應美國霸權。透過此一跨國對照，本文期能補足既有冷戰文學研究中，對於性別、階級與帝國資本運作交織複雜性的探討。透過分析臺韓四部小說，探究兩國作家如何透過吧女／洋公主的書寫，展現邊緣女性在經濟困境、社會污名下的生命掙扎，並釐清兩國文學對美國霸權的殊異回應。

III. 戰後臺灣與韓國社會下的吧女／洋公主

美軍將臺灣作為越戰期間的休閒站，隨著美軍駐紮，臺灣的酒吧產業迅速發展，這些酒吧不僅提供飲酒，還涉及性交易。臺灣的吧女社會背景各異，有些是農村貧困女性，因經濟困境進入酒吧行業，也有些是希望藉由與美軍發展關係而改變命運。她們主要負責陪侍美軍，提供娛樂甚至性交易。然而，由於社會污名，她們常被視為道德敗壞，無法融入

主流社會。

在臺灣熱烈擁抱美軍的同時，美軍所帶來的熱鬧與紛擾展現在1966年11月《自立晚報》的版面上。標題是：「兩百餘美軍抵花蓮渡假／吧嬢們聞風趕往／酒吧業生意鼎盛」，內文提到一百五十名渡假美軍在下午時分上岸，使得市區街頭到處都是美軍的身影，酒吧也因而生意興隆，一批吧女更是從各地聞風趕來花蓮。「越戰打起來後，幾乎每天都有一艘艘軍船滿載著洋兵來臺度假，基隆港突然繁鬧了。港口邊，那些破爛的酒吧每天擠進擠出的都是送財來的洋鬼子們。」⁴⁾由上述片段，可以確認到「美軍的走向決定勞動力的方向」，吧女們不遠千里來賺取美金，美軍就是美金。另一方面，這則新聞旁，又有一則短評，標題是：「觀光製造混血兒／社會平添新問題」，雖然字裡行間沒有提到美軍，不過內文指出隨著觀光業的發展，沒有父親的混血兒也開始流浪街頭。⁵⁾儘管吧女／洋公主帶來經濟效益，但她們被視為「國族恥辱」，她們因與外籍士兵發展關係而備受歧視，即便之後離開酒吧業，仍難以回歸正常社會，甚至她們的混血子女也被邊緣化。

美軍代表著富裕的消費者、享樂者、經濟支配者。臺灣的「R&R特區」——作為過境的樂園，越戰美軍來臺僅停留 5 到 7 天，他們是「遊客」。美軍的離開是必然的，因此關係從一開始就設定為短暫的、契約式的短暫消費。因為「美金」，當地女性自動獻身。在越戰 R&R 的經濟結構下，美軍挾帶優勢資本美金」進入臺灣，形成高度不對等的消費關係。當地底層女性在經濟匱乏的推力下，被迫或妥協地進入性產業，其身體成為跨國資本交易下的勞動商品。在〈小寡婦〉中，美軍被描繪成需要被哄騙、被服務的對象。臺灣女性（吧女）不僅只是被剝削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精明的操盤手，試圖通過美軍獲得階級流動的機會（如嫁到美國）。文本展現了臺灣吧女並非單純被動的受害者，而是在結構限制下具備一定「經濟能動性」的參與者，試圖藉由跨國親密關

4) 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曾心儀集》，頁174。

5) 陳中勳，《失落在膚色底下的歷史：追尋美軍混血兒的生命脈絡》，行人出版。《失落在膚色底下的歷史》：來臺美軍的玫瑰假期，讓吧女與性病被劃上等號 -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係的建立，尋求階級流動與脫貧的可能。〈小寡婦〉中的酒吧經營，這不僅僅是性工作，還反映了 1960-70 年代臺灣在加工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下，為了賺取外匯，整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形成了一種共謀結構。接單——接受美國的R&R訂單。加工——將本土原料（臺灣女性）進行包裝（穿上寡婦裝）。出口——輸出服務以換取外匯。黃春明透過這個荒謬的故事，指出了臺灣「經濟奇蹟」背後的精神創傷，是『買辦』與『依附發展』的深刻寓言。〈小寡婦〉這部作品在探討冷戰臺美關係時，具有不可替代的複雜性與深刻性。女性的身體成為了換取美金的籌碼。與韓國小說中赤裸裸的強暴與飢餓不同，臺灣小說展示了一種更為複雜的、「自願的」投入。

反觀韓國，在韓戰與越戰期間，大量美軍駐韓——「基地村」作為內部的殖民地，形成專門為美軍提供娛樂的產業。在小說〈誤發彈〉與〈冀地〉中，美軍基地是一個「固定的、永久的、擁有治外法權的空間」。它像一個巨大的腫瘤或傷口，深深嵌入韓國。韓國的洋公主生活圈圍繞著基地村建立的貧民窟。美軍不僅是軍人，更是當地的「立法者」與「物資分配者」、「征服者」，是高壓與掠奪性的。如〈冀地〉中所描寫的，美軍對芬兒的佔有與施虐，伴隨著身體的毀損與尊嚴的徹底踐踏。

臺灣的吧女與韓國的洋公主在戰爭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的驅使下，被視為一種商品，透過身體的交易來換取經濟上的生存機會。這種商品化過程並不單純是性交易的問題，而是整個經濟結構如何將女性納入全球經濟體系與工具化的部分。綜合郭彥伯、戴華萱等針對臺灣吧女的社會史與文學研究，以及金萬洙、姜鎮鎬等人對韓國基地村文學的剖析，本文梳理既有文獻，歸納出四部小說中對於這群邊緣女性的三種主要敘事隱喻與再現策略：

一、經濟奇蹟背後的勞動者：在美軍帶動的經濟蓬勃時期，吧女所經歷的勞動剝削或傷害常被忽視，社會往往僅注重量化的經濟收益（美金外匯），卻未能正視其勞動與犧牲。如黃春明〈小寡婦〉精準捕捉了

女性如何在美軍消費的誘惑與生存壓力下，進行自我商品化與身分展演，揭示了臺灣社會在經濟起飛初期的功利與異化。

二、沉迷物慾的女性：因普遍認為吧女賺取美金相對優渥，這份工作常被視為時髦，文學作品中常刻畫她們拜金或受物質誘惑的情節（如購買舶來品）。然而，許多研究與文本亦指出，她們同時肩負寄錢回家、照顧家族或償還債務的經濟重擔。戴華萱的研究指出，女性性工作者對高消費物質的依賴與對原生家庭的犧牲往往是一體兩面的。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細膩刻畫了 bar 女依賴美金生存卻又備受身心折磨的矛盾心態；而李範宣〈誤發彈〉中，妹妹明淑穿著破洞絲襪卻能拿出鉅款救濟兄長的情節，更凸顯了女性在承擔家庭倫理與背負社會污名間的悲劇性張力。

三、屈從西方霸權的國族創傷：本國女性與外國軍人發生關係，常引發當地男性的失落與無力感，這種無奈往往轉嫁在女性身上，使她們承受嚴重的社會歧視，甚至被視為國族恥辱的象徵。在南廷賢〈糞地〉中，洋公主遭遇的性剝削與暴力，已超越個人的悲慘遭遇，成為韓國在冷戰結構下喪失民族主體性、傳統父權徹底瓦解的集體創傷隱喻。

透過上述基於先行研究的分類框架可知，臺韓作家雖皆觸及冷戰下的性剝削議題，但受限於兩國殊異的歷史條件，其文學再現的側重點實有著從「資本異化的商業共謀」到「國族創傷的絕望控訴」之根本差異。這些文本並非單純反映客觀史實，而是作家面對強權與社會劇變時，所建構出的複雜抵抗與焦慮敘事。本文所探討的四部小說分別呼應了上述類型：黃春明〈小寡婦〉深刻描繪了第一與第二種類型，展現女性在經濟發展下的自我商品化與共謀；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則兼具這三者，透過男性的視角反思這種屈從與剝削的矛盾；而韓國李範宣〈誤發彈〉與南廷賢〈糞地〉則強烈對應第三種類型，將洋公主的處境視為國族被西方霸權強暴與剝奪的極致恥辱。⁶⁾

IV. 臺韓文學作品中的吧女與洋公主探析

6) 郭彥伯，〈尋找吧女：冷戰、美軍、性觀光的歷史初探〉，頁242-245。

以下聚焦於臺韓四部小說：臺灣黃春明〈小寡婦〉、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與韓國李範宣〈誤發彈〉、南廷賢〈冀地〉，討論臺韓文學作品中「吧女」與「洋公主」的各種類型與困境，將女性視為性商品化的面貌，臺韓作家看待吧女與洋公主的不同視野。

一、作品簡介

(一) 臺灣文學中的「吧女」

1. 黃春明⁷⁾〈小寡婦〉(1975)：

〈小寡婦〉描寫1968年因應美國政府獎勵越南戰爭立功的大兵來臺渡假，臺灣各地掀起酒吧的風潮。臺北一家酒吧，顧問馬善行讓酒吧小姐穿著中國傳統婦女的裝扮，在外國人面前謊稱自己是死了丈夫的「小寡婦」，並在*China Post*上大肆刊登廣告。小說以此情節反諷美軍在越戰的失利，並揭示臺灣因越戰效應而興起的「無煙囪工業」的時弊。

在美國學習旅館管理的專業人士馬善行，被聘為酒吧顧問，策劃以「小寡婦」為主題的營銷策略。在馬善行的指導下，酒店小姐穿著中國傳統服飾，對外國客人自稱「小寡婦」，吸引顧客。以喜劇形式與社會批判戲謔的敘事風格，透過幽默誇張的手法來批判臺灣社會的資本主義樣態，使讀者在娛樂之餘反思現實問題。⁸⁾

2. 曾心儀⁹⁾〈酒吧間的許偉〉(1977)：

〈酒吧間的許偉〉描寫了一位名叫許偉的男性，在酒吧間的經歷，透過他的視角，展現了當時社會的現實與人性的複雜。小說深入探討了個人在社會變遷中的迷惘與掙扎，「他幾乎不能全然地面對、接受父親在酒吧工作的事實。那種被人稱為靠女人吃飯、烏龜、拉皮條……的事實。……直至這一回，眼見父親病危，他才改變意志。」(頁176)可見當

7) 黃春明(1935-)，生於臺灣宜蘭縣羅東鎮，臺灣當代重要的鄉土文學作家。作品多描寫農村生活，捕捉鄉鎮小人物的生活風情和傳奇軼事。

8) 廖素琴，〈黃春明七〇年代城市小說之語言與文化探析〉，頁148-153。

9) 曾心儀(1948-)：本名曾台生，生於臺南市的眷村。年幼即進入社會職場，擔任過百貨公司店員、美容師、記者等。1978年起投入臺灣民主運動，參與多項街頭運動。她的眷村生活與社會經驗，提供了豐富的小說素材。

時對酒吧業的批判，以及世人的看法、許偉的無奈。曾心儀透過許偉一角的內心掙扎，具象化了當時臺灣社會對酒吧業的道德焦慮，以及底層從業者在經濟生存與社會污名之間的拉扯。因經濟壓力與父親的受傷住院，不得不進入酒吧行業的許偉，試圖賺取生活費與擺脫現實困境。但最終因大環境不如意，美軍撤退，酒吧業式微下，黯然離開。他試圖透過酒吧生活找到歸屬，但最終仍無法融入酒吧生態，以失敗告終。

（二）韓國文學中的「洋公主」：

1. 李範宣¹⁰〈誤發彈〉(1959)：

〈誤發彈〉描寫了擔任會計師辦公室書記的哲浩，住在解放村的貧民區。同住的越南人¹¹母親，因思念北方故鄉，以致瘋狂，日夜不斷喊著「走吧！走吧！」、音樂系出身，曾經漂亮的妻子，如今連自己曾是美女的事實都忘得一乾二淨，最終在醫院分娩途中死亡、年幼的女兒因營養不良逐漸消瘦、妹妹明淑成了洋公主、傷痍軍人弟弟英浩，最終不顧良心，自暴自棄，因搶劫罪被逮捕。灰心絕望的哲浩，拔掉4顆牙齒後，在貧血狀態下坐著計程車，但好像誤發彈一樣，無法確定目的地，盲目前行。

2. 南廷賢¹²〈糞地〉(1965)：

〈糞地〉主人公洪萬洙和母親、妹妹一起等待父親從戰場歸來。但國家光復了，父親卻沒有回來。出去歡迎解放軍的母親遭受美軍強暴，受刺激瘋狂致死。時光流逝，萬洙在街上遇到了妹妹芬兒，才知妹妹芬兒已和美軍同居，但同居人——史匹上校因不滿芬兒不如美國妻子的肉體美，每天虐待和毆打。有一天，萬洙聽說史匹上校的美國妻子來韓，他主動請纓帶她去韓國景點旅遊。到了香米山，萬洙為了弄清楚美國人的

10) 李範宣 (1920-1982)，生於平安南道新安州。1955年在《現代文學》上發表小說《暗標》、《星期日》，開始了創作生涯。主要作品有《鶴鄉的人們》、《誤發彈》等。

11) 越過38線從北韓來到南韓居住的人。

12) 南廷賢 (1933-2020)，生於忠清南道瑞山市，1959年在《自由文學》上發表《警告區域》和《煙囪下的遺產》，正式踏入文壇。作品集包括《你是什麼》、《煙囪下的遺產》等。

1965年，在《現代文學》3月號發表〈糞地〉，被指控反政府作品而遭受迫害。雖立即解除迫害，但〈糞地〉事件卻引起了軒然大波。他以寓意和諷刺手法大膽地揭露現實的政治、社會和倫理的黑暗與弊端。特別是對美軍駐韓期間所引發的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該作品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成為韓國文學史上重要作品之一，亦是最激烈的反美小說之一。

肉體美，要求史匹太太脫掉衣服展示。驚慌失措的史匹太太當然會拒絕，洪萬洙便強暴了她。最終，史匹太太高喊救命逃下山，遂向美軍當局告發洪萬洙的行為。萬洙躲在香米山，推測會因美軍的轟炸而死亡，以告白體的敘事形式敘述真相。

二、臺韓作品中出現的吧女／洋公主異同

在臺韓文學作品中，共同點是都將女性以性商品來對待與認知。作家們在字裡行間皆直言不諱。在〈酒吧間的許偉〉中，「如果你喜歡哪個小姐，可以帶她出去……。」(頁178-179)「這個客人是從美軍退伍，……幾次都挑三揀四，嫌小姐不合他胃口……他又來了。……揀了張沙發坐。他坐下後，仔細瀏覽店裏的每一位小姐，好像走到皮鞋店在挑皮鞋似地。最後，他的眼光盯著沙莉身上。洋人向許偉揮手，……『我要那一個。』」(頁189)，文本顯示，在美軍的消費視角下，吧女往往被徹底物化為可供交易與消遣的商品，是物件，不是「人」。而小說中的臺灣男性角色許偉，則反映了在跨國資本與軍事霸權的雙重壓迫下，本地的男性——許偉則是為了「美金」而閹割了自己的男性尊嚴。

〈小寡婦〉中，「你們從現在起，就要扮演最不合乎時代，最落伍的中國婦女的一種，小—寡—婦。這種小寡婦的特性是，外表上看來是一座冰山，其實裡面是火山。」(頁175)以資本主義的理念，來消費異國風情——小寡婦，吸引美國人。小說中的核心行銷策略是讓吧女扮演「年輕寡婦」。販售「楚楚可憐」的東方形象，這滿足了越戰美軍（西方/陽剛/征服者）對於東方女性（弱小/傳統/需要被保護）的幻想。臺灣經營團隊精準地洞察了西方男性的心理需求，進而轉化為消費力，這也是與韓國小說最大的不同。

在韓國文本中，女性往往被描寫為受迫於結構暴力下的被動犧牲者；相對而言，〈小寡婦〉中，吧女則展現出主動迎合跨國資本與自我商品化的一面——「笑著數錢」，她們透過展演特定的「東方形象」——「扮寡婦」這件事，獲取物質報酬，隨後因為能住進高級公寓、賺取美金而感到某種程度的認同與滿足。這裡沒有明顯的強迫，只展現了可怕的

共謀共生結構。從出資老闆、策劃專家，到第一線吧女，甚至到默許這一切的政府與社會，所有人都是這條「外匯生產線」的一環。吧女們並非不知道自己被物化，但為了生存與階級翻身（遠嫁美國），她們選擇了「策略性的順從」。這正是臺灣在冷戰經濟體系下的縮影：為了生存，可以／願意扮演任何帝國主義者喜歡的角色，為了賺錢，商品化、系統化的出賣女性肉體。

〈酒吧間的許偉〉中的許偉，不同於韓國小說中徹底被邊緣化的男性，他是酒吧的經理，他是「交易的促成者」。許偉代表了臺灣在冷戰結構中的買辦位置。他依靠美軍的消費來支付父親的醫藥費，這意味著他的生存依賴於他所厭惡的對象。他不能像韓國主角萬洙那樣純粹地憤怒，因為他自己也是共犯結構的一部分。他的痛苦來自於自我厭惡。許偉雖然厭惡美軍的傲慢，但也無法否認美金的力量。¹³⁾

〈誤發彈〉中：「一位戴著太陽眼鏡的韓國女子坐在緊握方向盤的美軍旁邊。那就是明淑。……並排站在哲浩旁邊的兩名青年嘖嘖咕咕道，『還挺時髦的。』『時髦？是啊，戴了太陽眼鏡嗎？』『那個也能嫁嗎？』（39）¹⁴⁾「如果當洋公主的妹妹明淑被抓，哲浩就要擔保身份。每當這時，哲浩就會在治安官面前抬不起頭來，接著，領著被巡警帶出來的明淑，一言不發地走出警署後門。每當這時哲浩就會哭。埋怨又討厭這唯一的妹妹。」（45-46）¹⁵⁾ 洋公主在當時社會承受著極端的污名化，時常面臨來自公眾的嚴厲道德譴責與排斥，任意蔑視與置喙；而其家族成員亦受此牽連，只能低頭接受眾人如此異樣的眼光被迫共同承擔社會的邊緣化處境與沉重的心理壓力。

13) 廖素琴，〈黃春明七〇年代城市小說之語言與文化探析〉，頁148-154。

14) 이범선, 〈선생님과 함께 읽는 오발탄〉, 頁39。以下小說內文為筆者譯文(韓翻中)。以下韓國小說皆如此。「언젠가 퇴근하던 길에 전차 창문 밖에 본 명숙의 꼴을 생각하고 있는 것이었다……. 핸들을 쥔 미군 바로 옆자리에 색안경을 쓴 한국 여자가 앉아 있었다. 그것이 바로 명숙이었던 것이다…….철호 바로 옆에 나란히 서 있던 청년 둘이 속닥거렸다.『그래도 멋은 부렸네.』『멋? 그래, 색안경을 썼으니 말이지?』……『저것도 시집을 갈까?』」

15) 이범선, 〈선생님과 함께 읽는 오발탄〉, 頁45-46。「양공주 노릇을 하는 누이동생 명숙이가 걸려들면 그 신원 보증을 해야 하는 철호였다. 그때마다 철호는 치안관 앞에서 낯을 못 들고 앉았다가 순경이 앞세우고 나온 명숙을 데리고 아무 말도 없이 경찰서 뒷문을 나서곤 하였다. 그럴 때면 철호는 울었다. 하나밖에 없는 누이동생이 정말 밋고 원망스러웠다.」

在〈誤發彈〉中，洋公主被視為家族的恥辱與必須隱藏的存在。〈誤發彈〉中的哥哥哲浩或〈糞地〉中的哥哥萬洙或失業、無能或無法養家的。他們眼睜睜看著家中女性為了生存而出賣肉體。美軍在此不僅是佔領者，更是超級雄性的象徵。他們擁有美金與槍械，輕易奪走了韓國男性的家庭地位。因此，在韓國小說中，女性的身體成為了展示韓國男性無能的傷口。這種恥辱太過強烈，無法被內化，只能轉為對內（酗酒、自殺）或對外（殺人、發瘋）的暴力，不可妥協的對立。這種關係是基於生存的強迫，所以不存在「協商」的空間。

在韓國文本中，美軍與洋公主的關係被定義為強暴/被強暴的結構。因此，男性敘事者的視角是單一的、道德絕對的——即對「污穢」的排斥與對「純潔」喪失的哀悼，是悲壯的。在臺韓的作品中，如此物化吧女/洋公主，她們在世人眼中，只是一件任人挑選的商品而已，可鄙夷、可歧視，隨時隨地都會遭受他人無情的辱罵。以下再細分四部小說中，被暴力、貧困，以及愛情所牽絆的吧女/洋公主。

（一）被暴力對待的吧女/洋公主

在文學作品中，吧女/洋公主常被商品化，因她們是使用身體作為交易手段來換取金錢。但在被商品化與物化的同時，伴隨而來的就是暴力與歧視。如〈小寡婦〉中，「『看你一頭紅頭髮，誰不知道你是在賺美金!』『是!但是並不會比用美金的流氓更丟臉!』……她想了想：『以前都是他把我打得半死。其實這次也是他打我的啊!看!我的臉。』……『他一把抓住我的頭髮，往地上碰。看，把我碰成這樣。』」（頁195-197）吧女們利用身體賺辛苦錢養家，不但不能得到尊重與感謝，甚至常遭遇身邊人的拳打腳踢，傷害最深的反而是最應該呵護她的伴侶，要求她拿錢出來讓他去賭博，如若不從，便遭毒打。賺美金的吧女竟比流氓更丟臉。

在〈酒吧間的許偉〉中，「月秀英出場近三個鐘頭，臉色蒼白氣呼呼地跑回來。……『鬼子差一點要打我!』……他拉著我，不讓我走，用力拉我的手臂，抓得我好痛。……這個缺德鬼跳舞的時候又親又摸，我被他羞辱至極!」……「『這鬼子真可惡!真可怕!……，他動作粗魯、

惡劣，搞了還要再搞，我若是跟他過夜，不知要被他折磨成什麼樣子！」(頁184-190)。吧女在進行跨國性交易時常處於高度的人身安全風險中，常有生命之憂，只能自求多福，其身體自主權缺乏體制保障；即便遭遇暴力對待，往往不僅求助無門，甚至可能面臨嫖客的二度經濟剝削與惡意刁難。

在韓國50年代韓戰以後的小說中，開始大量出現對美國人的描寫，其中的美國士兵總是被描寫為凌駕於韓國人的存在，以統治者或軍官的面貌登場。¹⁶⁾ 〈冀地〉中，對妹妹芬兒的同居人史匹上校的勾勒是如此，每晚辱罵虐待狂，拳打腳踢，暴戾又高高在上的美國軍官，「史匹上校每天晚上責怪芬兒那豐滿的下半身，用不堪入耳的辱罵和惡言惡語虐待、折磨芬兒。……不僅如此，甚至每晚毆打芬兒，……但是，每當聽到沒有任何抗拒，默默忍受史匹上校的拳打腳踢，偶爾只傳來，「哎呀，哎呀」的芬兒哭聲，我也只能感到崩潰的痛苦和壓迫感，像傻瓜似的一起哭泣。」(頁76)」¹⁷⁾ 萬洙難過的守著淪為洋公主的妹妹，以及思念著被美軍強暴的母親，內心遭受萬般磨難。但是妹妹芬兒的身體和順兒一樣，只能承受史匹上司的性與暴力的雙重肆虐，成為性與武力犧牲品的女性形象昭然若揭，作者控訴著，被美軍蹂躪的芬兒身心，好比當時動盪紛擾的韓國。小說中的美國軍官史匹上校被賦予了強烈掠奪性與破壞力的征服者形象。主角萬洙作為無力保護家屬的兄長，其目睹妹妹遭受性剝削的過程，進一步凸顯了弱勢民族在強權面前的無力感。劇中兄長的失能與母親的精神崩潰，深刻隱喻了韓國傳統父權與家庭結構在美軍勢力介入下的全面瓦解。

(二) 被家庭所累的吧女／洋公主

16) 김만수, 〈한국소설에 나타난 미국의 이미지〉, 頁 468-469。

17) 남정현, 〈분지〉, 頁76。「참 어이없게도 스피드 상사는 밤마다 분이의 그 풍만한 하반신을 이리저리러니 탓잡아가지고는, …… 차마 입에 담지도 못할 욕설과 폭언으로써 분일 못 견디게 학대하는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 심지어 분일 마구 구타하는 일조차 있다는 사실에 이르러서는 실로 아연할 뿐이었습니다. 그래도 용케 아무런 항변이 없이 스피드 상사의 그 스피디한 발길질을 견디며 간간 '아야, 아야' 하고 울기만 하는 분이의 그 가느다란 울음소리가 들려올 때마다 저는 무엇인가 무너져 내리는 아픔과 압박감을 느끼며 저도 분일 따라 병신처럼 울어야만 했던 것입니다。」

除了商品化與物化女性的問題，在吧女與洋公主的故事中，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為家庭的犧牲。這些女性進入酒吧業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家庭經濟困境所逼迫。許多吧女與洋公主將自己的收入寄回家鄉，支持全家的生活。在〈小寡婦〉中，「一個人為生活所逼迫，而學習生活所需要的伎倆，比起一般學習的情形，進步得更快。」（頁173）「不管怎麼，還沒答應他嫁到美國，在這裡的物質生活，已經叫她覺得十分滿意了。鄉下的母親，也有美國罐頭、胡椒粉、面霜、菸酒享用。老人家樂得怕別人不知道她享福。」（頁183）我們看到主角為了家計而被迫進入酒吧行業，在市場與家庭之間被壓迫的女性，她的犧牲為家鄉的老人家——母親啟動了享福模式。由她一人的犧牲，換取家人的溫飽與享福。

在〈酒吧間的許偉〉中，芳芳和費雯則是進入酒吧後沈淪的例子，「芳芳每當迷幻藥癮一發，什麼上班都忘記了，平常賺錢不夠用。費雯要養孩子，每個月要固定送錢回家。碰到有賺錢的機會，她都不放過。」（頁183）「芳芳仍然吃迷幻藥，藥性發作的時候又哭又鬧，……眼淚鼻涕縱流，躲在牆角呼喚媽媽。幾個月之中，店裏的小姐們出了好幾樁悲劇，一位山地小姐吃安眠藥自殺獲救。一位上班不久的小姐染上了淋病。三位小姐連接拿小孩。」（頁186-187），為家庭與現實進入酒吧後，走上了身心交迫的困境。有的吧女，染上毒癮，不穩定情緒，再加上因毒品上癮的花費，讓酒吧女的經濟更捉襟見肘，個人命運的悲劇於焉而生。有的則是每月要固定寄錢回家，因此，壓力很大，所有賺錢的機會都不能放過。作品中，更細膩的勾勒出酒吧女有了錢，可以盡孝，又可以享受，兩者同樣強烈，同樣不可抗拒的樣貌。「這些小姐們，一方面憎厭這個工作，不愛應付客人，時常憂慮賺錢不夠開銷，卻又受著都市物質文明的引誘，追趕時髦，添衣服、化粧品、首飾，把大量的花費當做排解愁悶的消遣。」（頁186）吧女們工作時的矛盾心理明顯，凸顯她們因賺美金得以脫貧、安家、享樂的喜悅感，揭示出吧女更立體細膩的形象。¹⁸⁾

18) 戴華萱，〈曾心儀小說中的女性性工作者研究〉，頁297。

韓國的〈誤發彈〉中亦有類似的描寫，作者刻畫了一名已越南7年，生活卻仍舊越來越困苦的家庭，因家境貧寒而被迫進入美軍酒吧工作的女性明淑，「哲浩再次走進門，說道：「要帶錢去吧。」呆呆地俯視著腳尖站著。明淑站了起來。……。「拿去吧。」，一疊百元鈔被扔在哲浩腳前的地板上。……哲浩的眼睛停留在明淑的腳後跟。尼龍絲襪破了一個雞蛋大的洞。哲浩在明淑那雙破洞絲襪的後腳跟上感覺到了某種乾淨。好長一段時間以來，哲浩久違地感受到了作為哥哥對明淑的愛。」(頁52-53)¹⁹⁾ 妹妹穿著破洞的絲襪，卻可以無私的拿出嫂嫂的醫療費。雖然為家庭犧牲並未獲得社會與家庭的認可或諒解，反而成為家族的「黑歷史」，即便她們改善了家人的生活條件，給與即時的援助，社會與家庭對她們仍是很苛刻。只有在哥哥哲浩接受了妹妹的援助與看到妹妹破洞的絲襪，揭露出妹妹明淑的節約品性時，哥哥哲浩突然感受到了妹妹乾淨的氣息，久違的產生了兄妹之情。此種嚴苛的社會道德標準，反映出傳統父權體系對涉足特種行業女性的雙重壓迫，使其在承擔家庭經濟重擔的同時，仍須承受難以卸除的道德枷鎖。

在〈糞地〉中，²⁰⁾ 「芬兒埋在我瘦削的胸懷，嗚嗚地哭了起來。然後，沒頭沒尾地，央求哥哥的原諒。但是我沒有精力去管別人的事。……在責備一個人或原諒一個人之前，想先吃點東西，想好好睡一覺的慾望更甚。……這時，芬兒大概猜到了哥哥的心情，微微一笑，悄悄地把我背進了客廳旁的房間。好溫暖。在牛奶、奶油、巧克力和口香糖

19) 이범선, 〈선생님과 함께 읽는 오발탄〉, 頁52-53. 「철호는 슬그머니 문 밖으로 한 발을 내디디었다. 『돈을 가지고 가야지 뭐.』 『..... 돈.』 철호는 다시 문 안으로 들어섰다. 우두커니 발부리를 내려다보고서 있었다. 명숙이가 일어섰다..... 『옛수.』 백 환짜리 한 다발이 철호 앞 방바닥에 던져졌다..... 철호의 눈이 명숙의 발뒤축에 머물렀다. 나일론 양말이 계란만치 구멍이 뚫렸다. 철호는 명숙의 그 구멍 뚫린 양말 뒤축에서 어떤 깨끗함을 느끼고 있었다. 오래간만에 참으로 오래간만에 철호는 명숙에 대한 오빠로서의 애정을 느꼈다.

20) 남정현, 〈분지〉, 頁68-69. 「갑자기 분인 저의 앙상한 가슴에 얼굴을 파묻고는 흐흫 느껴 울더군요. 그리고 밀도 끝도 없이 오빠의 용서를 바란다고 조르는 것이었습니다. 하지만 저는 남의 일에 관여 할 만한 기력이 없었거든요..... 한 인간을 책망하거나 용서하는 일에 착수하기 전에 우선 뭘 좀 먹고한잠 푹 자고 싶은 욕망만이 저를 위협하고 있었으니깐요..... 순간 분이는 오빠의 그러한 심경을 대충 짐작하겠다는 듯이 한번 빙긋 웃고는 조용히 자기의 거실 바로 옆방으로 저를 안내하여 주더군요. 따뜻했습니다. 우유와 버터와 초콜릿과 껌 등이 자아내는 향기 속에서 저는 목석처럼 순종했었지요.」

的香氣下，我馴服了。」(頁68-69) 洪萬洙因為妹妹的情婦生活，纔有了溫飽，也有了賣美貨的工作機會。他雖然對美軍深惡痛絕，但不得不屈服，甚至覺得很溫暖，身體屈從現實，接受了妹妹芬兒帶來的溫暖的房間、美味的食物與賣美貨工作，甚至得到了旁人羨慕的眼神，萬洙心中的掙扎，令人鼻酸不捨。「戰爭經濟受害者」的複雜性，受害者不僅是被剝削，他們甚至依賴剝削者維生。這種「加害者/施惠者」與「受害者/受惠者」界線模糊的狀態，正是冷戰結構下邊緣群體最深層的焦慮。〈冀地〉延續了南廷賢對美軍強權的批判，但更聚焦於底層男性如何因經濟無能而「卑躬屈膝」販售妹妹的身體，深刻諷刺了韓國當時作為美國附庸的地位。萬洙象徵著受壓迫但試圖反擊的民族良心。他對美軍史匹上司，象徵著弱小民族絕望且原始的反抗。雖然失敗，但他拒絕順從。

(三) 吧女／洋公主的愛與恨——混血兒

在酒吧等聲色娛樂場所的吧女們，她們有的和美軍談起戀愛，有的當作工作從各方面照顧美軍起居，也有比較悲慘的強暴案件，這些不同的異性互動，一個個混血兒出生了。孩子出生之後，通常就是母親辛苦的開始。美國父親會將母子接去同住的少之又少，美軍在假期結束或任務輪調後，多半選擇規避跨國撫育責任，使得這群單親母親與混血後代必須獨自承擔社會的污名化與經濟困境。沒有太多謀生能力的單親母親，只能將孩子交給娘家甚至育幼院收養，而混血兒在成長過程中也常因為外表和缺少父母而遭受歧視，過著辛苦的日子。〈小寡婦〉：「十一年前剛出道的時候，…那時認識一位黑人士官史密斯。他使她(阿青)嚮往美國，使她以為去了美國就可以擺脫所有的痛苦。看在這份上，她也就不在意他是黑人了。史密斯還說：『你是黃種人。我是黑種人，我們都是一樣的有色人種。跟我們不同的是白種人。』……她勤練英文，想著有一天會跟史密斯到美國去生活。(頁182-183)……像哄騙小孩，一直到她在產院生了小黑，才把來自美國南方的史提夫氣跑了。……為了小黑，她實在花了不少心血和金錢。托養小黑的那個貧窮家庭，竟然為了養小黑，幾口人的家庭的生活改善過來。……托養的那一家人，已經無

法容忍他的頑皮和壞毛病。嘻皮笑臉的，動不動看到小女孩子就想抱人家、吻人家。有時凶狠起來，真叫人害怕。才接回來交給母親，沒幾個月，惹得鄉下的小村子雞犬不寧。……『還用說，罵他雜種，最後還不是罵到他的母親……。』」（頁185-186）其中可以看出，黑人士兵與白人士兵的不同，其身分雖比吧女高一些，但黑人亦是被歧視的一群，但吧女們為了追尋「美國夢」，便也「不在意」他是黑人了。再者，「小寡婦」除了是酒吧名，同時令人聯想其中的酒吧女在越戰結束後，也可能成為被美國大兵遺棄的真正「小寡婦」。由此，倘若小說中的「廣告」代表強勢入侵的西方文明，那麼充滿中國傳統氣氛的「小寡婦」們，則暗喻居於弱勢的臺灣；在〈小寡婦〉的最後，在戰場上九死一生回來的美國大兵比利與酒吧女菲菲攜手的場景，何嘗不是少之又少的九牛一毛呢？在〈酒吧間的許偉〉，「他主要是接白人。因為恐怕店裡有黑人，會令白人止步。」（頁179）也可看出黑人的不受歡迎，其地位比白人是矮了一截，而以白人為中心的美國社會，黑人只不過是周邊人，與我們的處境並無二致。但很多吧女會退而求其次作選擇，為了實現去美國的梦想。萬一懷孕，產下混血兒，也只能靠自己養育。²¹⁾

在韓國，特別是經過美軍的駐紮，韓國對美國的幻想與神格化變得嚴重，美國式的一切，成為改變社會生活方式的決定性衝擊。對陷入經濟窘迫和混亂的戰後韓國人而言，美國是敬仰和理想化的存在，沒有理性的自覺，盲目地追隨和絕對地重視。這種對美國的追隨，伴隨着對韓國國民的自卑感和貶低。

這時，有些女性人物所具有的另一面向，即為了去美國作為美國人生活，盲目地希望與美國男人結婚，或者為了實現這個願望，將自己的肉體(性)作為手段。為了實現自己希望和憧憬的生活，向美國男性毫不猶豫地商品化自己的身體，表現出的樣貌。²²⁾

〈酒吧間的許偉〉中，許偉的矛盾在於，他既是受害者（父親住院、民族自尊受損），又是獲益者（依靠美軍消費維持生計）。這種「共犯

21) 戴華萱，〈曾心儀小說中的女性性工作者研究〉，頁298。

22) 김만수，〈한국소설에 나타난 미국의 이미지〉，頁470。

結構」即臺灣經濟奇蹟背後的新帝國主義陰影。韓國則表現為更激烈的生存焦慮。親美不僅是為了錢，更是為了在社會秩序崩潰中尋求唯一的「安全保障」。人面對強權時既排斥又渴望的矛盾心理。〈小寡婦〉中特殊的商業化運作模式，以及〈酒吧間的許偉〉中的反思，應給予更細緻的解讀，以突顯臺韓兩國在面對美國時不同的社會應對機制。「我們必須區分兩種截然不同的『美軍凝視』」。在韓國小說〈誤發彈〉與〈糞地〉中，美軍是「佔領者」。韓戰後的廢墟狀態，使得美軍基地村成為唯一的權力與資源中心，韓國女性的性勞動往往是為了家族最基本的「生存」，帶有濃厚的屈辱與被迫性質。美軍在這裡是常駐的、立法的、甚至擁有治外法權的「超級父權」象徵。相對地，在臺灣小說〈小寡婦〉中，越戰美軍是「過客」。他們是從死亡邊緣暫時逃離的消費者。因此，臺灣社會對待他們的方式，並非單純的恐懼，而是一種將其視為「經濟獵物」的「商業實用主義」。

三、臺韓作家對吧女／洋公主的不同視野

以上所述的四部小說中，大致可分為，男女作家與臺韓作家等兩種不同視野的討論。首先，黃春明與曾心儀兩位男女作家的討論中，黃春明〈小寡婦〉描寫美國大兵來臺度假，設定在 1968 年，將重點放在行銷策略上，由男性知識份子絞盡腦汁獻出經營理念，以販賣臺灣女性性工作者特有風情的新奇感，「要主動地把老美吸過來」（頁156）、「錢也要賺得比以前的方式更多」（頁157），極具創意戲謔地展演如何汲汲營營於發一筆跨國色情財的故事。本國男性經營者與美軍嫖客站在同一陣線，形成跨種族男性同盟，臺灣男性經營者樂於打造本國女性成為暢銷商品，行銷販賣國際。²³⁾同樣的題材到了女性作家曾心儀筆下，卻有別於黃春明小說裡美軍高朋滿座的酒吧，她選擇將時間點落在越戰尾聲的蕭條酒吧。〈酒吧間的許偉〉中，酒吧已是黃昏產業，駐臺中的美軍撤走，那兒的酒吧都關門，原本以美軍為對象的酒吧，如今都是透

23) 謝世宗，〈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臺灣社會顯微——重讀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40-45。

支、不能維持的景況。臺灣酒吧業逐漸萎縮，吧女必須北漂到大酒店才得以餬口。

曾心儀安排年輕男性許偉不得不接下病危父親的工作，百般不願的成為吆喝美軍消費的皮條客。許偉對此舉感到侮辱難堪，但又得屈服於生活現實，內心矛盾掙扎、痛苦不已。「他雖然已經由於父親病危的樣子而改變心意，來店裏幫忙；……卻怎麼樣也不能停止思想的衝突、掙扎，良心的譴責。」（頁183）許偉不似〈小寡婦〉的男性經營者戮力於行銷跨國色情生意，絞盡腦汁於如何讓業績長紅以賺取最大利潤；反倒是顧及女性尊嚴，只求能打平酒吧的基本開銷與吧女的生活費。甚至屢次斥喝、扭打並轟走凌辱吧女的美軍嫖客。「許偉一個上前，握緊拳頭放在洋人臉前，他狠狠瞪著洋人。」（頁185），即便生意一落千丈也在所不惜。顯見出自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發想，有別於男性作家獨獨犧牲女性尊嚴的敘事。在維護女性的前提下，男性經營者許偉不再與美軍站在同一陣線，不再積極，而是相對勉強的，投身酒吧業。有時，甚至為維護吧女，而起身抵抗反擊，是可以憤然揮拳的護衛者——「他敏捷、猛烈地攻擊洋人」（頁185），不再將女性單純地視為「商品」販賣。但不勝唏噓的是，堅持捍衛吧女工作尊嚴的許偉，最後仍無法顛覆跨越經濟秩序，只能扛著行李黯然離開吧館（頁192-193）。

再者，女性作家不只聚焦在吧女的受辱感與哀怨痛苦，也致力描摹她們的矛盾複雜心態，討厭從事性交易，卻又樂於享受高消費物質，希望有朝一日遇到良人，帶她們脫離苦海泥沼的矛盾心理。「在過一天是一天，悄悄期待著遇到一位商賈富人、英俊才子來一把將她們拉起，相偕遠走高飛離開這個環境。許多小姐等不到理想的結婚對象，退而求其次，就與經濟條件不錯的已婚者同居。」（頁186）確實較男性作家更關懷吧女的內在感受與心理狀態，而不是單純侷限在男／女、尊／卑、主／從的二元對立上。以嚴肅的態度看待女性的身體，迥異於男性作家嘻笑戲謔的書寫筆法，呈現出不只是單一性別的論述。²⁴⁾

有別於臺灣作家的論述，韓國李範宣〈誤發彈〉和南廷賢〈冀地〉

24) 戴華萱，〈曾心儀小說中的女性性工作者研究〉，頁288-316。

中，寫作視野是更加悲壯的，兩部作品的主角都已被逼入絕境，如〈誤發彈〉的哲浩，因思念北方故鄉而瘋狂的母親，難產而死的妻子，營養不良發展遲滯的女兒，因強劫入獄的弟弟；最後，哲浩落得無處可去的下場。「哲浩嘴角流著的鮮血已沾溼胸前的襯衫卻無人發覺，計程車緩緩駛進交通號誌綠燈下的十字路口。」(頁60)²⁵⁾在〈冀地〉中，萬洙母親因被美軍強暴瘋狂而死，妹妹卻成為了美國士兵的妾，「讓人無語的是，居然成了也許就是強暴你的罪魁禍首——某個美國士兵的小妾。」(頁64)²⁶⁾李範宣在〈誤發彈〉與洋公主妹妹明淑，最後似乎是以和解結尾；但南廷賢〈冀地〉中，和美軍同居的妹妹芬兒，因哥哥萬洙強暴美國人妻的罪愆，其悲慘的命運已可預期。韓國作家作品有著更多的嚴肅與沉重。有別臺灣作家是廣述整體的酒吧業與吧女，韓國的兩部作品，其中的洋公主，是自己的妹妹，而非他人，其描述便不同。作品中，常可見男主角與妹妹合而為一感到羞赧的陳述，如哲浩在聽到他人對洋公主妹妹明淑的評頭論足時，「哲浩的臉因羞愧一熱，……然後走到對面中間的門邊，轉過身去。那顯然不只是一種悲傷的情緒，如啞巴吃黃連般，苦澀直往嗓子裏冒。」(頁39)²⁷⁾立即臉紅，感到丟臉，又不知所措，不能直視當洋公主的妹妹。〈誤發彈〉和〈冀地〉的敘事，無法客觀，因兩部皆是作家／男主角的第一人稱敘述，或可說，對洋公主妹妹的陳述只是小說中一小部分，兩個作品更重要的是對時代、戰爭與美軍的控訴。

因為駐韓美軍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韓國社會始終籠罩在戰爭隨時可能重啟的恐懼中。小說中的氣氛是壓抑、焦慮且充滿死亡氣息的，如〈誤發彈〉中的牙痛與血。臺灣則是「戰爭的後台」，是越戰的後勤基地與

25) 이범선, 〈선생님과 함께 읽는 오발탄〉, 頁60. 「철호의 입에서 흘러내린 신지피가 흥건히 그의 와이셔츠 가슴을 적시고 있는 것을 아무도 모르는 채, 교통 신호대의 파란불 밑으로 차는 네거리를 지나갔다.」

26) 남정현, 〈분지〉, 頁64. 「어이없게도 당신을 겁탈한 바로 그 장본인일지도 모르는 어느 미 병사의 첩 노릇을 하게 되었다는 이야기인 것입니다.」

27) 이범선, 〈선생님과 함께 읽는 오발탄〉, 頁39. 「순간 철호는 확 낮이 돌아올랐다……. 그리고 반대편 가운데 문계로 가서 돌아서고 말았다. 그것은 분명히 슬픈 감정만은 아니었다. 뭐라고 말할 수조차 없는 숫명이 같은 것이 짝 목구멍을 치밀었다.」

休假地。戰爭發生在「別處」（越南）。這導致臺灣小說中的氛圍呈現出一種荒謬的「嘉年華感」——別人在流血，我們在數錢。黃春明筆下的批判性，正是在於揭露這種「依靠他人的死亡來繁榮」的道德尷尬與罪惡感。

因此，解讀這兩國的文本時，必須意識到，韓國作家處理的是「創傷」，是對主體性被強行剝離的痛苦吶喊；而臺灣作家處理的是「異化」，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分工初期的迷惘。若未釐清此二種霸權運作の本質差異，便難以精準解讀〈小寡婦〉中商業戲謔背後的自我異化，以及〈冀地〉中底層男性絕望抵抗的反殖民意涵。

黃春明的〈小寡婦〉之所以在冷戰文學中獨樹一幟，是因為它揭露了臺灣在冷戰結構中的特殊生存之道：不是被動的受害者，而是精明的、自我物化的推銷員。小說〈冀地〉中的芬兒，象徵著被外來強權（美國）強暴並依附其生存的韓國主權，反映了韓國知識分子對自身無能的憤怒與自卑。〈小寡婦〉中的臺灣女性，集體參與了這場將女性包裝為「年輕寡婦」的展演，反映了臺灣在冷戰經濟體系下，為了生存與發展（賺取外匯）而展現的集體共謀與彈性。這不僅是受害，更是一種主動的經濟策略。南廷賢〈冀地〉筆下的男性往往感到閹割般的「恥辱」與無能狂怒。芬兒被美軍上士蹂躪，象徵著韓國主權的喪失，男主角的憤怒直接指向美軍的殘暴與自身的無力，這是一種抵抗路徑。然而，臺灣作家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筆下的許偉，其心理狀態則是「矛盾」。他厭惡美軍的傲慢，但他父親的醫藥費、他的生計卻又完全依賴美軍的消費。許偉的痛苦來自於「自我厭惡」——意識到自己為了生存而必須對帝國主義者強顏歡笑。這精準地捕捉了臺灣在冷戰結構下，既依附美國又渴望主體性的精神分裂狀態。

在韓國基地村文學的脈絡中，如南廷賢〈冀地〉與李範宣〈誤發彈〉，文本所折射出的是戰後極度匱乏與絕對權力不對等下的深層集體焦慮。美軍在文本中不僅是軍事同盟，更被刻畫為具備治外法權的「超級父權」與空間侵略者。文本中女性（如芬兒、明淑）的身體受虐與性剝削，往往被韓國男性作家轉化為「國族主權受損」與「傳統父權失

能」的強烈隱喻，為底層階級在社會秩序崩解、生存條件極度窘迫下，不得不採取的極端生存策略。作家的筆觸因而充滿了無法調和的悲憤、自我厭惡與絕望的反殖民抵抗。

相對而言，臺灣在越戰期間作為美軍的後勤休假地，其文學再現呈現出另一種地緣政治的複雜面貌。黃春明〈小寡婦〉與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中的美國大兵，多以「具備強大消費力的過客」形象登場。文本中的吧女與酒吧經營者展現出高度的「經濟實用主義」。小說深刻描繪了臺灣社會如何為了賺取外匯，將本國女性的異國風情進行系統化的「包裝與輸出」。這裡的文學批判力道，並非全然指向美軍的直接暴力，而是直指臺灣社會在面對跨國資本誘惑時，那種甘於自我物化、在剝削結構中尋求階級流動的「共謀關係」與「道德異化」。

綜上所述，雖然臺韓小說同樣處理了洋公主／吧女題材，但其內在邏輯截然不同。韓國作為冷戰最前線承受的直接暴力，與臺灣作為後勤基地所經歷的結構性暴力不同。透過比較這兩者，不僅看到了女性的苦難，更看清了美國霸權在東亞運作的複雜光譜——它既是殘暴的征服者（韓國），也是慷慨但傲慢的消費者（臺灣）。

V. 結論

吧女與洋公主的故事不只是女性個人的悲劇，而是戰爭、經濟與社會結構變遷的縮影。臺灣與韓國的發展模式不同，但在戰爭經濟與社會階級變遷的影響下，這些女性的命運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些文學作品不僅是對歷史的記錄，更是對當時社會價值觀的批判與反思，提醒人們關注被歷史遺忘的群體。

吧女與洋公主的故事揭示了女性在資本主義與傳統家庭價值觀的雙重壓迫下的困境。一方面，她們被視為市場中的商品，必須迎合男性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她們又背負著家庭的期待，必須為家族的經濟狀況負責。這樣的雙重壓力使她們幾乎無法逃脫社會的框架，即便透過酒吧行業賺取高收入，她們仍然受到社會排斥，無法獲得與男性相同的機會

與尊重。這些女性的故事不僅反映了戰後東亞社會的經濟變遷，也重新思考資本主義與傳統家庭價值觀如何聯手塑造女性的命運。

這些小說不僅描繪了吧女與洋公主的生活，還對戰爭經濟與資本主義全球化進行批判。臺灣作品黃春明〈小寡婦〉、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呈現吧女如何在經濟與社會壓力下求生，並透過戲謔的方式揭示戰爭經濟對女性的剝削。黃春明〈小寡婦〉展現了一種將性交易「產業化」與「倫理合理化」的荒謬過程。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則聚焦於酒吧是一個殘酷的經濟戰場，吧女不僅是美軍的消費對象，也是酒吧老闆眼中的勞動力。女性為了生計進入此場域，其身體被明確標價，反映了戰後臺灣底層女性缺乏其他經濟選擇的結構性困境。

韓國作品李範宣〈誤發彈〉描繪的是韓戰後的絕對貧困。主角哲浩作為一家之主卻無力養家，妹妹明淑淪為「洋公主」並非為了致富，而是為了全家人的「生存」。美軍贈送的尼龍絲襪，與哥哥那顆疼痛卻沒錢拔掉的爛牙形成強烈對比，象徵著為了生存必須出賣自尊的悲哀。主角哲浩作為一個典型的『多餘之人（誤發彈）』，深刻反映了傳統父權角色在極端戰後環境中的徹底失能。他既無力阻擋妹妹透過性勞動維持家計，亦無法撫平母親因戰爭創傷而導致的精神崩潰，凸顯了韓國基層男性在軍事霸權下的深層無力與精神困境。

南廷賢〈糞地〉則以更激進的視角，將美國的經濟援助視為一種「排泄物」。美軍帶來的物資與金錢（如口香糖、巧克力）被視為污染民族精神的毒素，而女性（芬兒）為了這些物質或在暴力脅迫下與美軍同居，象徵了韓國經濟主權的喪失與被寄生狀態。在〈糞地〉中，哥哥萬洙雖然試圖反抗，但這種反抗是原始且無效的。母親因女兒受辱而發瘋，象徵著傳統母性與家庭紐帶在強大的外力介入下斷裂。兩者著重描寫「洋公主」，以致整個家庭，整個國家的悲劇命運，並揭示她們如何成為國族與社會價值觀下的犧牲品，乃至整個家庭、社會、國家的不幸。

本文透過臺灣黃春明〈小寡婦〉、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與韓國李範宣〈誤發彈〉、南廷賢〈糞地〉四部文學作品的對照，探討了冷戰時

期東亞邊緣女性在跨國軍事霸權與資本主義擴張下的處境。這四部作品並非客觀歷史的直接拓印，而是臺韓作家在面對「新殖民經驗」與「壓縮現代化」時，透過文學建構出的複雜焦慮敘事與抵抗姿態。綜上論述，本文透過臺韓文本的跨國比較，提出以下兩點主要學術觀察。

首先，本文打破了將「美國霸權」在東亞視為單一鐵板塊的既定迷思。透過比較可知，冷戰地緣政治的具體實踐在臺韓兩地存在著「結構性的歧異」。韓國所經歷的「戰後常態駐軍」，使文學作品充滿了領土被侵犯、民族自尊遭閹割的「創傷敘事」，美軍呈現出殘暴的征服者面貌；而臺灣所經歷的「越戰 R&R 休假」，則使文學作品聚焦於資本流動下的「異化敘事」，美軍化身為挾帶雄厚資本的傲慢消費者。這種軍事存在形式的差異，直接決定了兩國文學對外來霸權截然不同的批判路徑。

其次，本文深化了性別、階級與帝國主義交織性的文學探討。在上述兩種冷戰結構中，「吧女」與「洋公主」的身體皆淪為跨國資本與軍事權力競逐的場域。她們既承受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勞動剝削，又背負著傳統父權社會的道德污名，甚至成為本國男性發洩國族無力感的替罪羔羊。然而，透過文學細膩的視角（尤其是女性作家的補充），也看見這群女性在結構壓迫中，試圖透過跨國親密關係的協商來維繫家庭生存或翻轉階級的微弱能動性。

總結而言，本文的臺韓比較研究不僅豐富了東亞冷戰文學的光譜，更指出在探討跨國性產業與帝國霸權時，必須細緻辨析不同國家在世界體系中所處的特定位置。這些文學作品作為時代的微觀切片，持續提醒我們正視隱藏在宏大經濟奇蹟與冷戰防線背後，那些被邊緣化、被物化的女性生命史。綜上所述，透過臺韓文學的互文對照可知，韓國文學以血淚書寫了民族的貧困與屈辱，悲憤抵抗。而臺灣文學則以諷刺與悲憫記錄了社會在資本化過程中的道德迷失，功利順應。這些文學作品不僅是對特定歷史時期的見證，更是對戰爭、性別與資本主義結構性壓迫的永恆批判。

참고문헌

【中文文獻】

- 吳明宗 (2010)。〈為她發聲——曾心儀與其職場女性書寫初探〉，《彰化師大國文經緯》，第6期，頁1-17。
- 林敬銓 (2020)。《戰爭與休閒：美軍在臺時期的酒吧、酒吧女》。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彥伯 (2019)。《尋找吧女：冷戰、美軍、性觀光的歷史初探》。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中勳 (2018)。《失落在膚色底下的歷史：追尋美軍混血兒的生命脈絡》。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 陳正芳 (2012)。〈文化交流下的歷史印記：論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形象建構〉，《臺灣文學學報》，第21期，頁137-170。
- 張淑雅 (2011)。《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衛城出版。
- 曾心儀 (1992)。〈酒吧間的許偉〉，《曾心儀集》(頁173-193)。臺北：前衛出版社。
- 黃春明 (2009)。〈小寡婦〉，《看海的日子》(頁147-264)。臺北：聯合文學。
- 廖素琴 (2009)。〈黃春明七〇年代城市小說之語言與文化探析〉，《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7卷第1期，頁131-160。
- 劉毓秀 (2002)。〈後現代性產業的慾望機制及其與後現代論述及後期資本主義的關聯〉，《中外文學》，第31卷第2期，頁39-67。
- 蔡岱叡 (2021)。《臺灣文學中越戰時期吧女小說的批判與抵抗——以陳映真〈六月裡的玫瑰花〉為例》。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世宗 (2009)。〈男性氣質與臺灣後殖民小說中的慾望經濟學〉，《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9期，頁37-67。
- 謝世宗 (2015)。〈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臺灣社會顯微——重讀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3期，頁37-65。
- 戴華萱 (2023)。〈曾心儀小說中的女性性工作者研究〉，《清華中文學報》，第30期，頁281-325。

【韓文文獻】

- 강경화 (2017). 〈양공주의 자기인식 양상과 삶의 방식에 대한 고찰 — 해방기와

- 1950년대 소설을 중심으로 —), 《현대문학이론연구》 71호, 5-38쪽.
- 강진호 (1999). 〈외세의 질곡과 민족의 주체성 - 남정현의 「분지」론〉, 《돈암어문학》 12호, 225-237쪽.
- 구자황 (2023). 〈「분지」 읽는 시간 - 1960년대 문화정책과 미국 표상을 둘러싼 소설의 운명〉, 《한성어문학》 48호, 127-155쪽.
- 김건우 (2011). 〈「분지」를 읽는 몇 가지 독법 - 남정현의 소설 「분지」와 1960년대 중반의 이데올로기에 대하여〉, 《상허학보》 31호, 253-282쪽.
- 김만수 (2008). 〈한국소설에 나타난 미국의 이미지〉, 《한국현대문학연구》 25호, 457-486쪽.
- 김은하 (2003). 〈탈식민화의 신성한 사명과 '양공주'의 섹슈얼리티〉, 《여성문학연구》 10호, 158-179쪽.
- 남정현 (2013). 〈분지〉, 《분지》(8-91면). 아시아.
- 박광일, 최태성 (2012). 《교과서밖으로 나온 한국사(근현대)》. 씨엔아이북스 (C&I Books).
- 박영준 (2010). 〈슬픈 풍자와 가족서사의 유형 - 남정현의 「분지」에 대하여〉, 《문학비평》 38호, 199-219쪽.
- 변화영 (2014). 〈한국전쟁의 문신, 흑인혼혈인과 양공주〉, 《현대소설연구》 57호, 295-320쪽.
- 변화영 (2015). 〈전후작가의 해방촌에 대한 체험과 재현〉, 《비평문학》 56호, 73-101쪽.
- 이나영 (2013). 〈글/로컬 젠더질서와 한반도 여성의 몸: 일본군 '위안부'와 미군 기지촌 '양공주'〉, 《동방학지》 161호, 3-38쪽.
- 이명원 (2021). 〈1960년대 한국과 오키나와 소설에 나타난 미국 패권주의의 인식과 비판 - 남정현의 「분지」와 오시로 다쓰히로의 「칠타일 파티」를 중심으로〉, 《한국문학논총》 88호, 211-242쪽.
- 이범선 (2013). 〈선생님과 함께 읽는 오발탄〉, 《선생님과 함께 읽는 오발탄》(12-60면). 휴머니스트 출판그룹.
- 임은희 (2017). 〈현대소설에 나타난 '양공주' 모티프의 다문화적 사유와 타자성〉, 《한국문예비평연구》 54호, 241-267쪽.
- 정재림 (2012). 〈1950-60년대 소설의 '양공주-누이' 표상과 오염의 상상력〉, 《비평문학》 46호, 457-478쪽.

홍윤표 (2015). 〈한일 전후 소설에서의 ‘팡팡’과 양공주 표상 = 전쟁 기억의 재현과 은폐〉, 《아시아문화연구》 40호, 207-235쪽.

황영주 (1999). 〈파편화된 기억과 완충지대로서의 식민지화 된 여성의 몸 : 미군기지의 양공주 다시보기〉, 《비교한국학》 5호, 101- 129쪽.

ABSTRACT

Gender and Class in Cold War-Era Taiwanese and Korean Fiction: Women in U.S. Military Entertainment Districts

Wenyu, LI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aiwan's "bar girls" and Korea's "Western princesses" (Yanggongju) became marginalized group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war economy amidst post-war social changes. By analyzing Huang Chun-ming's *The Little Widow (Xiao Guafu)* and Tseng Hsin-yi's *Hsu Wei in the Bar (Jiubajian de Xu Wei)* from Taiwan, alongside Yi Beom-seon's *The Aimless Bullet (Obaltan)* and Nam Jeong-hyeon's *Land of Excrement (Bunji)* from Kore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omen's struggles with economic hardship, social stigma, and family disintegration.

Entering the speci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due to the stationing of U.S. troops, these women bear the trauma of colonial and war legacies while being deeply exploited by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se literary works indict this injustice, reflecting on unfair social criticism and the structural oppression of women by war. Focusing on their predicaments and anxieties,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serious intersecting issues of race, economy, and gender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broken families suffering from poverty and bereavement.

Keywords: Bar girls, Western princesses (Yanggongju), Gender, Class,
Women's literature